

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

随新民

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边界问题成了两国关系的晴雨表,是中印关系中最重要议程之一,其他议程都不同程度地与之相联系。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印关系因边境冲突和战争跌落谷底,此后持续冷淡。直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边界矛盾的缓和,中印双边关系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本文试图说明,中印边界矛盾的升级和缓和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而信仰体系、环境因素、学习过程是影响印度相关认知的重要因素。

一、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简要评估

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的重镇在美国、印度和英国。国外学界最早的研究可谓“价值一边倒”,即这类研究通常倒向印度一边。¹⁾后来,学界又出现了具有强

1) 此类研究成果主要有:Sarvepalli Gopal, "Sino-Indian Relations: Neville Maxwell's Apprehensions," *The Round Table* 245, Jan. 1972; M. Singh, "The Legality of McMahon Line: A Indian Perspective," *Orbis*, No. 11, 1967; Parshotam Mehra, *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 A Study of the Triangular Contest on India's*

《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1期(总第5期),第62—85页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烈反思性特征的“价值修正派”^①。尽管这两类研究结论不同,但都是从地缘政治和战略视角出发,引用史料归纳或解释印度有关中印边界的主张、中印边界冲突事件和战争。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开始关注中印边界问题,其主要研究方法与上述两类国外学者差别不大。^②

North-eastern Frontier Between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1904—1947) (London: Macmillan, 1974); Margaret W. Fisher and Leo E. Rose, *Himalayan Battleground: Sino-Indian Rivalry in Ladakh* (London: Pall Mall Pr, 1963); P. C. Chakravarti, *India's China Polic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C. Chakravarti, *India-China Relations* (Agra India: M. G. Publishers, 1991); W. F. Van Eckele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Hague: Mouton de Nijhoff, 1964); George N. Patterson, *Peking versus Delhi*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3); S. R. Johri, *Chinese Invasion of Ladakh* (Lucknow: Himalaya Publications, 1969); S. R. Johri, *Chinese Invasion of NEFA* (Lucknow: Himalaya Publications, 1968)。

① “价值修正派”研究成果主要有: Alstair Lamb, *The China-India Border: 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The McMahon Line*, Vol. 2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5);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C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1972) 及其《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南亚研究》,2000年第1期,第41页; Karunakar Gupta, *The Hidden History of Sino-Indian Frontier* (Calcutta, India: Minerva Associates Publications, 197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涉及边界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Gyaneshwar Chaturvedi, *India-China Relations: 1947 to Present Day* (Agra India: M. G. Publishers, 1991); C. V. Ranganathan and Vinod C. Khanna, *India and China: the Way ahead after “Mao's India War”* (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 Pvt Ltd, 2000); S. R. Sharma, *India-China Relations 1947—1971: Friendship Goes with Power* (New Delhi: Discovery Publishing House, 1999); *India-China Relations 1972—1991* (New Delhi: Discovery Publishing House, 2003); J. W. C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Kanti Bajpai, ed., *The Peacock and the Dragon: 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2000)。

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王宏伟:《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1949—199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 Xuecheng Liu,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nd Sino-Indian Relation*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4); 赵蔚文:《印中关系风云录》,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 张敏秋主编:《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宏伟的研究史料很翔实,分析也很深刻,书中多次提到印度的误解; 刘学成的研究史料挖掘充分,对达旺一带边界的变迁所作的分析很有见地。代表性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叶正佳:《50年来的中国中印关系:经验和教训》,《国际问题研究》1999年第4期; 戴超武:《印度外交政策、大国关系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载于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蔡佳禾:《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李华:《1959年中印边界起因及苏联反应探析》,《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 房建昌:《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 房建昌:《近代中印西段边界史略》,《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王中兴:《60年代的中印边境

20世纪60年代以来,决策分析和危机管理研究的成果为中印边界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学者们开始尝试利用主观层面的认知心理来说明中印边界问题。这一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坎特里尔(Albert H. Cantril, JR.)、弗尔兹伯格(Yaacov Y. I. Vertzberger)和霍夫曼(Steven A. Hoffman)。

坎特里尔利用“田野调研”的方法研究了印度对中印边界纠纷和边境冲突事件的认知。1962年夏末和同年11月,他两次组织对印度公众的问卷调查,并以两次调查的结果作为研究的配对样本。两次调查的样本量分别为2366和2014。调查问卷设计采用的是“自我评定等级”测量模式¹,问卷内容涉及印度公众对国家认同、不结盟政策、中国形象等方面的认识。统计分析表明,印度公众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认为应加强防御力量的建设来对付中国的“侵略”,不能为了获得外国军事援助而牺牲国家独立;中印边境冲突只是中国对印度的“侵略”,而非“共产主义的侵略”。坎特里尔的调查设计和统计分析过程比较细致,统计推断也基本反映了印度公众在中印边界危机期间的即时认知和主流舆论。但从问卷涉及的领域看,其价值倾向非常明显。不过,坎特里尔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印度决策层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具体认知,更遑论这些认知的来源。

弗尔兹伯格以1959—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和战争为案例,研究了尼赫鲁的观念、性格、态度,进而揭示了外交决策过程中错误知觉的动力机制以及错误知觉的常态性。作者认为,中印边界冲突是错误知觉和错误计算导致国际危

与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反击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张植荣:《中印关系的回顾与反思》,《当代亚太》2000年第8期。此外,部分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成果包括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章汉夫编写组编著:《章汉夫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杨公素:《沧桑90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张力:《印度总理尼赫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孙上海主编:《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1 “自我评定等级”量表的设计和编码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即被采访者对理想目标的预期和对现实状况的评价。从现实的最差状况到最期望的目标共分为10级。参见 Albert H. Cantril, “The Indian Perception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Clash,”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8, Summer 1964, pp. 233—234

机最为典型的案例。^① 弗尔兹伯格的研究重点在于说明三个影响过程,即“客观环境”与心理环境之间的差异和交换对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信息编码和解码中的错位对决策进程的影响,以及环境因素如何通过认知形态和认知过程影响决策过程。在弗尔兹伯格的研究议程中,“环境”包括全球、地区、国内、双边关系环境几个层面,但他没有系统分析影响决策者认知过程的价值信仰、政治传统、战略文化。此外,弗尔兹伯格的研究忽略了社会化进程对领导人认知的影响,对印度有关中印边界认知形态的研究也较为欠缺。

霍夫曼的《印度与中国危机》一书关注的也是国际危机行为。作者希望通过结合史学和政治学方法揭示危机决策的一般规律,而中印边境危机则是其重要的案例。正如布雷彻(*Michael Brecher*)所言,对印度面对压力时对外行为的认知分析同时也揭示了所有政府面临外交政策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惊人共性。^② 霍夫曼的研究考察了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三个阶段的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个人信仰。^③ 其研究的缺陷在于:首先,由于作者研究的前提是中印危机的根源在于边界纠纷,所以其分析过程虽然注意到了印度政治精英的心理环境、心理固化、信仰因素对其决策的影响,但并没有涉及印度对中印边界认知的具体形态。其次,作者对印度信仰的界定也较为褊狭,即信仰仅表现在历史性边界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而未涉及印度的政治哲学、文化传统。再者,作者将态度和信仰混淆在一起,也没有明确区分信仰与知觉这两个概念。此外,作者是在“态度棱镜”主题下分析印度对中印边界看法和中国反应的^④,但并未阐明这两者是否存在逻辑关系。

还需指出的是,弗尔兹伯格和霍夫曼等人的研究限于危机管理和决策分析,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决策黑箱”研究。他们的研究不仅没有聚焦于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而且也很少涉及印度关于边界认知的来源问题。此外,中印边界问题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后,却出现了缓和,印度的相关认知又是如何变

^① Yaacov Y. 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1962*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4), p. xvii.

^② Steven Hoffma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Foreword, p. xi.

^③ *Ibid.*, pp. 47—50, 165—167, 215—217.

^④ 文章本身并没有界定“信仰”的内涵,但从论证过程中很容易推导出作者的倾向性。

化的?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所在。

二、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

最能反映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认知特性的文本材料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初印度政界就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产生的争论、1956年后中印总理之间的往来信件以及相关外交照会。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认知趋于固定,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所调整。概括而言,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认知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

尼赫鲁在不同场合下表达过这一认知心理。在1958年12月14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他写道,1954年10月访问北京时,“我”曾提到中国新近出版的地图“把两国之间的边界划错了。我们假定这是由于某种错误造成的。而且我当时告诉你,我们不很担心这件事。因为我们的边界很清楚,不是什么有争议的问题”^①。在1959年3月22日的信中,尼赫鲁又说,中印边界是基于地理特征、国际条约或协定以及传统管辖而确定的。“传统疆界遵循以喜马拉雅山脉顶峰分水岭为界的地理原则,但是除此之外,传统疆界的大多地段是由当时的印度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专门国际协定确认的。”“就占中印边界大部分的这三段来看^②,我们出版的地图上所划的边界具有基于地理、传统和条约的充分权威性。剩下的从尼泊尔、印度、西藏三方交界处到拉达克的一段也是传统的,并且沿线有着明显的地理特点,即沿着南面、西面水系与北面、东面水系之间明显的分水岭划分,以往的税收记录和地图以及几十年来印度行使的

① J. Nehru, "Letter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to the Prime Minister of China, 14 Dec, 1958," in A. Appadorai, ed., *Selected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47—1972*,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96.

② 尼赫鲁在这里所说的“三段”边界并非中国方面通常所说的东、中、西三段边界,而是指我们所说的西段、东段和印度的“保护国”——锡金同中国西藏地区之间的边界。印度方面认为,锡金与中国西藏之间的边界是由1890年的《中英专条》确定的,并于1895年在地面上标定。

管辖权肯定了这种划法。”^①所以,“我国地图关于中印疆界的划法不仅有天然和地理特点依据,而且符合传统,并为国际协定所肯定。”“正是基于相信我们两国共同疆界总问题业已得到令中印双方满意的解决,我才几次在议会里公开宣布,已出版地图上所标明的我国疆界是毋庸置疑的”。^②

在印度看来,即使承认中印边界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属于边界争端,顶多算是一些“小问题”。在1959年3月22日的信中,尼赫鲁不止一次强调:“我们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但有某些很小的边界问题有待解决。”“中印之间并没有重大的边界争端。我们认为,从来就没有存在这样的争端,而且在1954年以及后续的会谈时我曾经表达了这一观点。”^③直到今天,印度一些政要仍然持这种认知模式。2001年,印度前外交秘书迪克西特(J. N. Dixit)撰文指出:“当时印度曾设法解决除中国‘挑战’印度领土完整以外的各种外交问题。中国地图把印度的领土划入中国的版图范围,周恩来与尼赫鲁之间的信件往来表明了中国人企图重新安排中印之间的国际边境线。印度拒绝了中国的提法,即1947—1949年已经存在的中印边界是人为的、单方面的、殖民主义的结果。”^④

(二) 中印边界早已形成

印度认为,“历史边界”能够证明印度领土要求的合法性,英印时期的有关条约或协定,包括“麦克马洪线”和“约翰森—阿尔达线”在内,只不过是“历史边界”的承认而已。“事实上,印度的现有边界一直是历史上的边界。不过在英国人时期,行政管理只是逐渐地扩散到这些边界线。”^⑤

^① J. Nehru, “Letter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to the Prime Minister of China, 22nd March 1959,” in A. Appadorai, ed., *Selected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47—1972*, Vol. I, pp. 504—506.

^② Ibid., p. 507.

^③ Ibid., p. 499.

^④ J. N. Dixit,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ighbours*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2001), p. 28.

^⑤ 《1959年9月26日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0年版,第200页。

以尼赫鲁为核心的印度决策层坚信,早在英国统治南亚次大陆之前,以文化、共同经历、传统习惯和地理等因素界定的印度已经存在若干个世纪。“英国人曾违反印度人民的意愿占领和统治印度次大陆。然而,印度的边界是几个世纪以来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确定的。”^①在印度决策层看来,英国人要么强化了这些边界,要么基于战略考虑或因缺乏对印度地理知识的全面了解而背离了历史形成的边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印边界的划定者,英国人并没有把自己的相关思维建立在历史证据之上。这也正是他们在边疆和边界决策时有意或无意牺牲印度利益的原因”^②。所以,对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文献档案,尼赫鲁等人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采纳。^③

对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部落地区,印度认为中国西藏在达旺地区的权威仅仅表现在宗教信仰领域,而在政治领域没有任何权力。在“麦克马洪线”酝酿出台前几十年,达旺地区就已经是独立于任何外来政治权威的实体。印度政府确信,“麦克马洪线”不是英国人的发明。早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已经在东北部所有山地部落地区行使着有效的、经常性的政治管辖权,而中国西藏则没有。“麦克马洪线”不过是承认了印度阿萨姆与中国西藏之间的自然分水岭分界线。^④

对于印度“历史边界”的认知,曾长期担任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的戈帕尔(Sarvepalli Gopal)做过非常精辟的表述。他写道:“撇开大量各种各样的传统、习惯和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的证据,只关注上个世纪临时绘制的几幅地图,这无异于为了眼前的灌木丛而丢掉森林。假定英国人到来之前的印度历史毫无价值,而且沉醉于英国统治时期政策制定中的细枝末节,并津津乐道某些关于边界的折中安排,其唯一目的就是凡事以英国人马首是瞻。这只能展示其智力上的浅薄。”^⑤

① J. Nehru, “Letter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to the Prime Minister of China, 26 Sept. 1959” in A. Appadorai, ed., *Selected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47—1972*, Vol. I, p. 560.

② G. Narayana Rao, *The India-China Border: A Reappraisal*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8), p. 30.

③ Steven Hoffma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p. 26.

④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05—306; Steven Hoffma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p. 27.

⑤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Vol. 3, p. 306.

同“历史边界”观念相伴的是另一种信念,即这些边界都是线性的。印度决策层认为,依据地理特征把边境标志点连接起来就是有关条约所指的中印边界,而有规律的贸易往来、放牧、旅游、行政管辖、赋税征管等活动则进一步证明了边界的存在。

(三) 中印协定已经解决了所有未决问题^①

中印协定签订后,尼赫鲁将其同边界问题联系在一起。1954年7月,尼赫鲁就中印协定向印度有关部门通报情况时,明确把该协定与两国边界联系起来。^②在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写道:“这项协定是我们同中国和西藏关系的起点。根据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同中国的协定,应该认为这条边界是牢固的、明确的、不容任何人谈论的。应沿边界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③

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尼赫鲁说:“关于印中边界问题,你会记得,当缔结关于中国西藏地方的中印协定的时候,曾经考虑了各种未决问题,包括有关我们边境贸易的一些问题。那时并没有提及任何边界问题,而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事实上,我们以为1954年愉快地缔结的中印协定已经解决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全部未决问题。”在谈到中国出版的涉及中印边界的地图时,尼赫鲁写道:“事实上,它在好几处直接穿越了印度的领土。我看了这点很惊奇,因为我过去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我们两国之间有任何边界争端。在达成1954年中印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未曾提到过这一点……就我们来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样的争端,而我在1954年及以后跟你会谈时,曾经说明过这一点。”^④

退一步讲,在尼赫鲁看来,即使存在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也应在边界问题上

^① J. Nehru, “Letter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to the Prime Minister of China, 14 Dec. 1958,” in A. Appadorai, ed., *Selected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47—1972*, Vol. 1, p. 496.

^② 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北京,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80—81页。

^③ D. R.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Bambay: The Tulsi Shah Enterprises, 1968), p. 138.

^④ 《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2—175页。

做出让步,接受印度方面有关边界问题的主张,作为对印度放弃其继承的西藏特权的回报。在印度看来,继承英印政府的遗产和继续推行英国怂恿西藏脱离中国的政策都是非常合理合法的。既然印度能够放弃在西藏“合法”继承的既得利益,那么中国又为何不能在边界方面承认历史“事实”呢?这只是礼尚往来,即使不公开承认,至少也应心照不宣。正如尼赫鲁所言:“我们已放弃在西藏的某些权利,……不过,我们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友好的关系以及对边界的实际接受。”¹

(四) 中国已经“默认”了中印边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

在印度决策层看来,“麦克马洪线”是中印的东段边界,这一点不存在任何争议。因为无论在过程上还是在程序上,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就印藏边界问题的讨论以及最后签订的边界协定都是合法的。“按照公认的国际惯例,必须认为其对中国和西藏都具有约束力。”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反对的是关于内、外藏的划界,而对印藏边界是认可的。²“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³

在回顾1956年周恩来访印就中缅边界问题发表的谈话时,尼赫鲁特别提出了“麦克马洪线”问题。“就在那个场合,你跟我提到中印边界,特别是所谓‘麦克马洪线’问题。这条‘麦克马洪线’包括中缅边界的一部分和中印边界的一大部分。我记得你告诉我,你不赞成把这段边界叫做‘麦克马洪线’,我答说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但是,为了方便,我们还是这么叫。你那时告诉我,你已经接受了同缅甸接壤的‘麦克马洪线’边界,而且不管很久以前发生过什么事,鉴于中印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你打算也承认同印度接壤的这条边界。你又说,你想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商量,并且打算这样做。我记得同你谈这件事谈

1 张力:《印度总理尼赫鲁》,第209页。

2 《1959年9月26日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96页。

3 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在人民院的演讲,《人民院辩论集》第5卷,第155—156页。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第64、75页。

了很久。你亲切地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①随后,尼赫鲁还附上了会谈后他自己的一段笔记:

周总理提到“麦克马洪线”,并且再次说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线,不过当时的中国政府曾经处理过这件事,而且没有接受这条线。考虑到(中国)同缅甸的边界争端,他曾研究过这件事。虽然他认为这条线是英帝国主义者确定的,是不公正的,然而由于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由于中国同有关国家——印度和缅甸——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认为它应该承认“麦克马洪线”。然而,它还没有同西藏当局商量过。他打算这样做。^②

在1959年3月22日给周恩来的信中,尼赫鲁历数“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后,又写道:“这条线适巧有一个优点,它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顶峰走的。以前我们讨论时,特别是1957年1月你访问印度时,我们很满意地注意到你准备接受这条线作为这个地区的中印疆界^③,而且我希望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达成谅解。”^④在1959年6月26日的信中,尼赫鲁就“麦克马洪线”问题写道:“我以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就边界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确切位于何处达成协议。(言外之意,中国不会就‘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甚至在我收到你1959年1月23日来信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会会对在我们看来几十年无可争辩地属于印度、而某些部分一百多年来就属于印度的4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提出要求。”^⑤尼赫鲁还认为,东段的“麦克马洪线”也同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边界一致。“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对印度政府行使管辖权直到习惯边界这一点提出过抗议。你自己也承认直到今年年初为止,我们

① 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在人民院的演讲,《人民院辩论集》第5卷,第173—174页。

② 同上书,第174页。

③ 黑体系本文作者所加,意在强调“疆界”和“边界”的不同,疆界指的是一片区域而边界指的是一条线。即使当时中国政府有意愿承认中印东段边界的现状,也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基于历史、现状和中印友好关系等因素考虑,准备接受一个边疆“区域”,而非印度方面认知的“麦克马洪线”边界。

④ 《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81页。

⑤ 《1959年9月26日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同上书,第191页。

的边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历届中国政府都尊重印度的边界。”^①

需要说明的是,印度认知中的“麦克马洪线”并非亨利·麦克马洪在地图上所划的那条线。印度认为既然“麦克马洪线”本意是以自然分水岭原则划界,那么当该线同地面事实状况不符时,印度就有责任对“麦克马洪线”加以纠正,使其成为真正的“科学边界”。所以,“麦克马洪线”的某些地段应该向北推进数英里才是“科学”的。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马及堆、扯冬等地区所发生的武装冲突,便是印度试图纠正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偏差”,使之成为真正“科学边界”的具体行动。

(五) 中国不会使用武力回击印度推进边界的行为

当中印边界争端成为不争的事实时,印度仍然认为,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全线推进不会导致中国的激烈反应,因而也就不会有边境战争。1960年4月,周恩来访问新德里,希望妥善解决中印之间的边界争端。但是,由于中印在边界认知及相应主张上存在重大差异,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两国总理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边境局势也没有缓和。

1961年和1962年夏季,印度加速实施“前进政策”,中印边境交火冲突增多,双方对抗进一步升级。对于印军超越“麦克马洪线”和西段实际控制线建立军事据点或哨所,中国反应强烈,规模更大、烈度更高的边境冲突乃至战争一触即发。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印度决策者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从1960年起,印度外交部陆续发表白皮书,即《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交换的照会、备忘录、信件及签订的协定》(共11册),公开中印分歧。^②此时,深受其顾问(特别是情报局长穆立克)影响的尼赫鲁依然深信,中国绝不会因边界纠纷对印度使

^① 《1959年9月26日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92页。

^② 中国也采取了对等措施,外交部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的“红皮书”,共7册。与印度不同的是,为了不扩大双方的分歧、争论以及缓和紧张气氛,中国只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主要的照会和信件,“红皮书”也仅是内部发行。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56辑,1998年2月,第47—48页。

用武力,中国方面日益强烈的警告只是虚张声势,中国不会因为边界问题对印度发动战争。

三、印度边界认知的来源

作为决定社会行为的社会认知的对立物是人的生物性认知,而非单个个体的认知。社会认知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信仰、环境、学习三个因素对印度的边界认知形成、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中印关系的演变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一) 信仰体系与印度的边界认知

信仰体系既包括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又包括在某个特定时刻认知主体的假设和预期。信仰体系内各个元素之间的区别越明显,在某个时间内彼此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就越大;信仰体系中的核心元素固化程度高于外围元素,即核心元素比外围元素更难变化。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对信仰、知觉、行动三者关系的表述颇具启发意义。他认为,信仰体系“像棱镜或过滤器一样,不仅影响行为者的知觉和对政治形势的判断,而且还为具体环境中的行动选择提供了规范和标准。当然,行动者对形势的判断和行动选择并非完全由信仰体系僵化地规定和决定”^①。

信仰既影响行动者的认知,又影响其行为方式。仅就信仰和认知的关系而论,“信仰是通过它与预期和解释之间的关系来影响认知的。信仰建构期望,一旦发生某一事件,我们可能会依据我们的预期来解释事件”^②。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和论证。^③信仰影响认知的另一种途径是类比,即人在赋予事件和环境意义时,往往会对事件和环境进行归类,

^① Alexander L. George, *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iv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Advi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0), p. 45.

^② James F. Voss and Ellen Dorsey, “Percep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Overview,” in Eric Singer and Valerie Hudson,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p. 11.

^③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M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45—150. 私人信仰是个体身份的标志,是个人的根本信念。

这一归类过程也是以往事件通过某种相似性来影响当前事件或环境并赋予其意义的过程。¹ 由于“社会认知者通常是在条件不准确、不完整的环境下做出复杂决策的”，再加上“时间紧迫、相关信息纷繁复杂以及事件本身的不确定性，社会认知者不可能在做出判断时去考虑所有可用的战略”，因此“人们通常会利用历史启示或捷径来降低问题的复杂程度，做简洁的操作”² 这就是历史性类比或归类给社会认知者的启示。当然，由于人们可能更关注事件或者形势之间的相似性而忽视其差异，类比过程难免会出现误导。此外，个人的信仰也会影响其类比过程和结果。类比既是信仰体系影响认知主体知觉的方式，同时类比过程又受信仰体系内容和结构的制约。

从信仰维度考察，印度有关边界问题认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 民族主义

在英印时期，关于印度民族历史的主流观点是：英国在印度建立统治地位之前，印度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同一性和历史认同感。“按照欧洲人的看法，印度，即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³ 即使在英印时期，英国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作标志，恰恰相反，他们只是通过规定界限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与其他帝国别无二致的帝国，为英国多年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拼凑到一起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依靠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的手段维护其存在”⁴。

同英国主流观点相反，印度民族主义者在挑战英国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和国家认同，即印度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但却不是新诞生的国家，印度作为一个以文化认同和历史特性界定的国家已经存在了数

1 纽斯塔特和梅分析了过去事件的当前影响和国际形势的类比，参见 R. E. Neustadt and E. R. May, *Thinking in Tim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瑞德则研究考察了试验环境下的政治类比，参见 S. J. Read, "Once is Enough: Causal Reasoning from a Single Inst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5, 1983, pp. 323-334 以及 S. J. Read,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Social Judgment: The Importance of Causal The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6, 1984, pp. 14-25

2 Susan Fiske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1), pp. 381-382, 391.

3 内维尔·马克斯维尔：《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上）》，《南亚研究》2000年第1期，第41页

4 同上

不清的年代；印度存在共同的语言——英语。这些民族主义者自视为印度人民的代表。经过若干年的积淀，印度民族主义者逐渐形成了支持自己政治要求的思想信念：“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明确界定的国家。”^①印度的政治独立不仅意味着印度管理自己的国家事务，而且还为印度提供了表达自己民族特性、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机遇。在印度独立日前夕的晚宴上，尼赫鲁动情地说，在午夜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印度恢复了生命和自由；一个长期被压迫民族的灵魂将向世人展示她的伟大和魅力。^②

这一信念自然成为尼赫鲁政府认知中印边界问题的“信仰棱镜”。对于印度政治精英而言，既然“印度自古以来存在”，那么“印度的传统习惯边界线也已长期存在，而且是自然演变形成的。因为边界都是基于人口活动、文化，以及山脊、分水岭等自然地理特征而形成”^③，而且印度“北部的边界位于现在的位置已经有约 3000 年之久”^④。所有这些都从心理上印证了尼赫鲁原有的认知：中印边界是“历史边界”。既然存在“历史边界”，印度岂能容忍就“已定边界”进行谈判？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任何内部或外来的领土挑战均被看成是企图亵渎神圣的地理学。^⑤

2. 大国情结

马克思说过，一部印度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屈辱的“被征服史”使印度的民族主义精英具有强烈的思想叛逆特质和“世界大国”的诉求。甚至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这些民族主义精英不惜通过道义、政治手段在意识观念中构筑这样一种“心理事实”。在当今的印度，成为世界大国已经不仅是少数政治家们的理想，而且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尽管印度政治家和战略精英们党派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他们都认为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

① Steven Hoffma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p. 25.

② Jawaharlal Nehru, *Independence and After: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1946—1949* (New York: John Day, 1950), p. 3, 转引自 Steven A. 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p. 48。

③ Steven Hoffma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p. 25.

④ 印度政府有关《印度喜马拉雅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白皮书》第二卷，第 125 页。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维尔：《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上）》，第 41 页。

⑤ 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etings: India’s National Identity,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 *Daedalus*, No. 3, 1993, p. 122, 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维尔：《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上）》，第 41 页。

度文明也注定会成为伟大的文明之一。¹ 因为“印度拥有成为大国的先决条件。尽管独立后 20 年她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但同经济落后和内部失调的实际状况相比,印度参与世界政治的程度和政治影响同其国土面积和地理位置等潜质是相符的”²。

尼赫鲁曾写道,印度在未来的世界里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³。在印度独立后的谈话中,尼赫鲁多次表达了这种思想。即使不能成为世界级的大国,印度至少也是拥有巨大潜力的亚洲大国。“考虑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或是一组国家的重大问题,印度因素都必须计算在内。无论问题属于国防、贸易、工业或是经济政策方面,印度都不能被忽视。她之所以不能被忽视,是因为她那令人信服的地理位置,也是因为她拥有事实的或潜在的力量和资源。无论她的实际国力如何,印度是一个潜在的强国,并且拥有支撑国家持续繁荣富强的资质。”⁴“凭借她目前的地位,世界今天已经充分承认,亚洲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的未来。印度正在成为亚洲的中枢。”⁵

“大国情结”和印度民族主义一样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巨大影响。在印度决策者的认知系统中,如果接受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主张,那就等于屈从中国的压力,损害印度的大国形象。所以,中国越是积极主张进行边界谈判,印度方面越是敏感。到 1959 年年底,尼赫鲁和绝大部分印度政府的决策者、顾问都确信中国没有或者不愿意理解印度对其自身大国形象的认知。⁶ 基于这种认知,拒绝中国有关边界谈判的建议就是一种必然的逻

1 Steven Philip Cohen, “Indian Perspectives on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aper delivered to The Summer Workshop on Defense, Technolog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 Asia. 转引自孙上海主编:《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第 2 页

2 Charles H. Heimsath and Surjit Mansingh,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Modern India*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1971), Preface, p. vii.

3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齐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7 页。

4 Jawaharlal Nehru, *Independence and After: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1946—1949* (New York: John Day, 1950), p. 248.

5 张力:《印度总理尼赫鲁》,第 146 页。

6 这是霍夫曼根据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得出的结论。参见 Steven Hoffma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p. 50

辑结果。不仅如此,印度还要向北推进,使边界更加“科学”^①。

3. 不结盟理念和第三世界“领袖意识”

不结盟原则是印度外交的哲学信仰,部分源于非暴力哲学理念。“不结盟”政策的实质就是独立自主地决定印度的内外政策。尼赫鲁认为,不结盟决不是孤立于世界,“不结盟政策不是消极的,而应如我希望的那样是积极、明确、充满活力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是一项政策,而仅仅是政策的一部分”。“这一政策只能依据我们的最佳判断来实施,并且它应能够推动我们主要目标和理想的实现。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优先关注自身的安全利益。”^②尼赫鲁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内,或许是两三年,世界会认识到不结盟中立的价值。印度不仅会得到国际权力斗争主角的尊重,而且会有更多的、正孤立无援的小国怀着比期待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强烈的愿望,期待印度发挥这方面的领导作用”^③。

尽管对美国的傲慢态度很反感,但尼赫鲁还是于1949年10月访问了美国,因为印度需要美国的援助,特别是粮食、机器、资本和货物。正如他反问梅农的那样:“印度何乐而不与美国靠近一些,借此增强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势力呢?”^④不难看出,不结盟信仰的工具性成分就是:游离于两大军事集团之外,左右逢源;作为不结盟政策的实践者和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既可以实现世界大国之梦,又能够增强印度的国家力量,因为“军队捍卫国家安全只是事实的一方面,通过政策(不结盟中立)维护国家安全同样真实有效”^⑤。

在印度决策者看来,在朝鲜战争中担当调停者以及斡旋解决战俘问题、倡

① Steven 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② Jawaharlal Nehru, “The Prime Minister’s Statement That Non-alignment Does not Mean Isolation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22 March 1949”; “The Prime Minister’s Statement That Non-alignment Can Only Be a Policy of Acting According to Our Best Judgment, 9 Dec. 1958,” in A. Appadorai, ed., *Selected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47—1972*, Vol. 1, pp. 14—16.

③ Jawaharlal Nehru, “The Prime Minister on the Implications of Non-alignment, 4 Dec. 1947,” in A. Appadorai, ed., *Selected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47—1972*, Vol. 1, pp. 8—11.

④ 张力:《印度总理尼赫鲁》,第146页。

⑤ Jawaharlal Nehru, “The Prime Minister’s Statement That Non-alignment Can Only Be a Policy of Acting According to Our Best Judgment, 9 Dec. 1958,” in A. Appadorai, ed., *Selected Document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1947—1972*, Vol. 1, pp. 14—16.

导并成功举行万隆会议、发起并引领不结盟运动等都印证了自己的大国地位。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尼赫鲁及其决策圈认为,在冷战中,印度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个中立者的角色。积极的不结盟外交使印度成为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沟通渠道和某种程度上的调停者。“印度的这种角色认知不仅仅是自我知觉,而且逐渐地得到其他卷入冷战漩涡国家的认同,这在肯尼迪—赫鲁晓夫时代尤其明显。”^①

既然印度的大国地位得到了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尊重,而且中国在一些涉及自身国家利益的国际事务中还需要印度的帮助,所以印度认为中国不会阻止印度为实现“历史边界”和“科学边界”而采取的推进行动。因此,在边界问题上,印度无需同中国谈判妥协。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美苏的反应、埃及和南斯拉夫的立场以及后来的科伦坡六国会议等的确部分地满足了印度的这种认知愿望。

(二) 环境因素与印度的边界认知

国际行为体不是在真空中认知世界的,“无论什么单位,其活动都可以从外部解释或内部理解,每个单位有一个决策程序,那些制定政策的人都会受到外部和内部的影响”^②。如果说信仰对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反映的是愿望思维效用的话,那么环境则是能否达成愿望的条件和机会。就本文而言,可以把环境看作是对决策者的认知、决策过程、外交行动的一系列限制因素。它既包括国际行为体互动形成的国际环境、国家实施行为的资源和限制,又包括政治精英和国家行为体所处的社会人文环境。

1. 国际环境与印度的边界认知

在尼赫鲁看来,印度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同全球环境密不可分。评估印度的现在和将来不能只着眼于当前的环境,更要有全球视野,要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和发展状况,因为印度未来的发展是以世界舞台上的风云变幻为条件的。在中印边界纠纷不断升级之际,尼赫鲁更是强调印度与国际大环境之

^① Steven 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p. 49.

^②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应该把我们(同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大背景下来评估。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世界,因为我们已经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分开,当今世界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为相互竞争的双方领导人提供了缓和紧张局势、解决问题的途径。”^①“中印边境冲突与全球形势是相互联系的,我们不能孤立地看问题。”^②那么,尼赫鲁感知的国际社会是什么景象呢?

东西方两大集团的长期对立是全球体系的根本特征,其中第三世界,特别是不结盟集团尤其是印度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调解人。这一角色也基本上得到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承认。首先,1953年后,印苏关系有了很大改善。斯大林的继任者改变了对不结盟政策的看法,不再视不结盟政策是对西方集团的支持,至少印度不会增强西方的实力。其次,美国也逐渐改变了对不结盟政策的偏见。约翰·杜勒斯曾经指责不结盟是一种不道德的、伪善的敲诈行为。但1959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增加了对印度的援助。1961年肯尼迪还向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发去了贺电。第三,尼赫鲁认为,“戴维营精神”标志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际体系的走向尽管还不明朗,但似乎正在从僵硬的两极时代向松散的两极甚至是均势割据转换,地区冲突引起的紧张局势也因此有所缓解。

在尼赫鲁看来,两个超级大国似乎已经担负起阻止地区战争的责任,因为它们担心地区战争可能会扩大为全球对抗。“两个大国之间的地区战争没有爆发,也不可能爆发。因为大国之间的战争都要演变成为大规模战争,而大规模战争很少有不扩大到世界大战的。”^③由此再稍加推论,人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在兴起的印度同中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战争,并演变成核战争。“印中之间的战争将是世界的一大灾难,因为它意味着世界大战。”^④所以,印度决策者认为其他世界大国在阻止中印对抗和战争方面

^①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 Parliament*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 1962), Vol. 1, p. 315, 转引自 Yaacov Y. 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p. 75.

^② Ibid., p. 50.

^③ Ibid., p. 279.

^④ Ibid., p. 62.

存在共同利益。¹

尼赫鲁相信,即使战争爆发,印度也是安全的,因为尼赫鲁把美苏模糊的表态理解为对印度心照不宣的支持²。任何邻国都不会对两大集团的调停者、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印度动武,因为这必然激起西方集团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愤³或是联合国的不满。中国非常希望恢复联合国席位,而印度则是中国最有效、最积极的支持者,所以中国不可能冒险进攻印度。⁴此外,20世纪50年代末,尼赫鲁等人已经察觉出中苏之间的分歧,并把区别对待中国和苏联作为印度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希望利用中苏分歧制约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行动。

2. 历史文献与印度的边界认知

有关边界问题的历史文献及其合法性对印度决策者的认知模式有着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印边界纠纷就是何种边界文献合法的思维模式之争。从各自的文献举证来看,所谓的“合法性领土主张”在印度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印度认为本国拥有充足的历史文献来证明其在东西两端领土要求的合法性及边界的无可置疑性,并且相信这一点已为双方向边界联合委员会提供的历史材料所证明。⁵正如尼赫鲁所言,“我们可以设想,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读者都会明白事实是——中国提供的证据没有实质内容,而我们的证据则毫无可疑之处”⁶。

印度为其领土主张提供的所谓“合法性”证据可大致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是由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并批准但中国中央政府没有批准的文献,如《西姆拉条约》。第二类是得到中国“默许”的文献和行动,即印度方面就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发表政治声明、阐述立场或采取行动,而中国方面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在印度看来,中国的沉默就是认同了印度的立场。例如,1950年尼赫鲁关于“麦

1. Jawaharlal Nehru, *Fortnightly Letters* (Unpublished), Dec. 15, 1959, 转引自 Yaacov Y. L.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p. 78.

2.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Vol. 2, p. 119.

3. *Ibid.*, p. 398.

4. *Ibid.*, p. 139.

5. 事实上,在建立中印边界联合委员会的同时,印度决策者指示有关方面对要提交的历史文献逐一进行过滤和筛选,去掉了所有与印度领土主张不符的文献,以免这些文献落入中国之手。参见 K. Narain, *Between the Lines* (Bombay: Allied Publishers, 1969), pp. 137-138; Yaacov Y. L.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p. 331.

6.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Prime Minister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Vol. 2, p. 7.

克马洪线”是印度东北部的边界线的政府声明,1954年和1956年两国总理谈话的内容等。第三类是历史形成的领土权利、已被接受的传统边界或者是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线。第四类是自然边界,即以分水岭、山脊、河谷等地形特征为基础而形成的天然边界。第五类是历史上有关方面签订的涉及边界划分的条约和协定。印度认为,政府的更迭,或订立条约时的强弱不平等背景并不会影响这些文献的效力。

通过对比中印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印度坚持认为支持其领土要求的证据远比中方的充分,因此,印度的领土主张具有法理上的合理性(参见表-1)。而且中印之间东、中、西三段边界已经划定,是得到承认的永久性边界。^①

表-1 中印领土主张的证据^②

证据类别	西段边界		中段边界		东段边界		总量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印度	中国
条约或协定	23		44		47		114	47 *
传统习惯线	51	66	89	41	40	91	180	198
实际控制线	108		146		82		336	

* 这47项条约协定没有依据东、中、西三段详细分目。

(三) 学习过程与印度的边界认知

学习过程是社会认知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它对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形态乃至行为都有影响。“学习让我们能够感知、获得知识并构筑关于世界的模式,从而使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同世界的关系,并且在世界中实现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学习,所以我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修正我们的行为。”^③

历史类比是相对简单的学习过程,可以使人从以往的事件中得到启示和洞

^① 印度1950年出版的地图把“麦克马洪线”标为东段的中印边界,而西段的边界则是1954年后出版的地图才标定的。1959年以前,尼赫鲁也承认西段边界的勘界划线还存在问题。后来在外交部历史司司长戈帕尔的说服下,尼赫鲁改变看法,认定中印西段边界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参见 S. P. Sharma, *India' Boundary and Territorial Dispute* (New York: Vikas, 1971), pp. 1—52。

^② S. Bhat, *India and China* (New Delhi: Popular Book Service, 1967), p. 92; Yaacov Y. 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p. 155.

^③ James F. Voss and Ellen Dorsey, "Percep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1.

察力,强化刻板形象,简化认知过程。印度独立后,决策者几乎完全继承了英印时期的陆地安全战略构想。“他们继承了英国过去所面临的防务问题,而且主要采取了和英国同样的防务战略。他们的注意力,同英国一样集中在陆上,而不在海洋边境上。”同时,印度决策者更加强调来自西北、北部、东北三个方向的全面威胁,重点经营西北方向的“三层战略疆界”^①。这样,他们完全继承了英印时期的“安全边疆”和“领土边界”观念。解放军进驻西藏后,印度将西藏作为“外层安全边疆”的构想彻底破灭,这使得印度决策者更加关注从东北边疆特区往西或西北方向经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等邦、印控克什米尔的“内层防御线”的安全。这条线的主体部分是所谓的“领土边界”,而且许多地段的界线并不清晰。因此,印度决策者对该线的关注程度可想而知。有学者认为,印度决策者对这些边界的认知陷入了由相似性和狭隘性而导致的“历史禁锢想象”的怪圈。^②

同历史事件学习相比,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件会对决策者的即时认知和心理倾向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从亲历学习中悟出的经验往往被行为者当作规律,从而使汲取教训、调整认知变得极其困难。独立初期,印度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沙文主义的行动处理与巴基斯坦和北部弱小邻国的边界问题。这些亲历经验渗透到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领域,而20世纪50年代印度向北推移边界的行动没有遭遇中国的反对则强化了印度的认知。

印度公开宣称“麦克马洪线”为东北部中印边界后的四年里^③,中国一直没有提出抗议。印度认为,这就意味着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不愿意因它同印度发生争端。1951年,印军占领达旺并接管达旺地区的行政事务,中国基于

① 西北方向的“三层战略疆界”是指:第一层为英印政府直接行使行政管辖的内层边界线;第二层是英印与阿富汗的边界线——“杜阑线”;第三层则是英国的保护国阿富汗同沙俄之间的边界线,即外层战略疆界线,阿富汗实际上成了英国与沙俄在中亚地区争夺的缓冲国。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强化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边疆的行政管辖。于是,英印政府在东段也试图如法炮制,构筑东方的“三层疆界线”。第一层指的是把英印政府的有效行政管辖范围稳定在“外线”;第二层是从“外线”向北部山地部落地区推进,以便形成一条对英印有利的印藏边界线;第三层则是清晰地划定西藏同中国内地其余部分之间的界线。其中,第二层和第三层是所谓的东方“三层疆界”的核心。这样,在东北段边界上英印政府为了获得所谓的“安全疆界”就必须向北实行“前进政策”。

② Yaacov Y. 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p. 223.

③ 1950年,印度正式宣称“麦克马洪线”是其东北部合法、永久的边界线。1953年年底,中印谈判开始,中方没有对此表态,最后双方签订的中印协定也没有涉及边界问题。

种种考虑没有对此表态。印度认为,这实际上是默认了印度在该地区的推进行策。进而推之,印度相信将“前进政策”推广到中印边境各段同样不会引起中国的反对。1954—1958年间,印度先后侵占中印中段传统边界中国一侧的波林三多、巨哇、曲惹、布什奇山口、香扎、拉不底,以及西段边界中国一侧的巴里加斯地区等。^①1961年出兵葡萄牙属地果阿的成功事例强化了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认知,即坚持推行“前进政策”,只要把中印边界全线推进到自己认知的边界并造成既成事实,中国就不得不接受边界现状。

四、印度认知的调整和双边关系的改善

理论上讲,中印双方的认知共同推动中印关系的演进。但从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看,中国的相关认知一直比较稳定。因此,中印双边关系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对边界问题的认知。1962年边境战争后,印度的认知结构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是外部环境压力和认知失调机制的失灵使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难以维持,相关知觉发生了一些细小而微妙的调整。事实表明,这些变化构成了印度认知调整和中印关系改善的环境条件和观念基础。

尽管印度总理英地拉·甘地一再强调1962年10月中国“进攻”了印度,但是,她也承认:“我们两国之间存在边界问题,这是容易使人十分激动的。本来有机会冷静下来:好吧。把这个问题先防一放。我相信,如果当初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后来问题可能就解决掉了。”^②1969年,英地拉·甘地两次向中国传递信息,希望中印两国努力寻找解决争端的办法,强调印度从没放弃通过谈判解决包括边界问题在内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而没有重复印度以往一贯坚持的观点:中国应首先接受科伦坡建议,然后再举行边界谈判。从其言论可以看

^① 1954年6月,印军在中印边境中段推进至乌热(印度称巴拉霍蒂),中方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备忘录和照会等形式多次提出抗议,指出乌热一向属于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印度的行动“不符合中印两国互不侵犯、友好相处的原则和中印两国总理最近发表的联合声明的精神”。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往来文件汇编(1950.8—1960.4)》,第366—391页。

^② 伊曼纽尔·波奇帕达斯笔录:《甘地夫人自传》(亚南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出,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认知出现了某些调整:第一,印度承认两国边界存在争议,这是对原有认知——中印之间没有未决问题——的修正;第二,边界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而边境战争前,印度坚持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第三,印度方面意识到,中国并没有接受自己提供的法理依据。边境战争后的边界实际控制线是中国的底线,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只能导致新的冲突甚至战争;第四,中印两国对边界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同。中国更关注边界以外与印度相关的中国国家安全、统一等问题,这同印度优先解决边界问题的认知存在着差距。

随着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认知的变化,中印关系逐步改善。1981年,两国启动了副外长级边界会谈,后来逐渐发展为“边界问题联合工作组”,并兼有非正式安全对话的功能。¹ 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华,中印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协定规定:中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现存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把实际控制线地区各自的军事力量保持在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² 1996年11月江泽民访印时,两国政府又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在肯定并强化1993年协定内容的基础上,这一协定又增加了新的共识,主要包括:通过协商解决对实际控制线走向有不同认知地区的分歧;扩大边境地区军事机构之间的交往和高层接触;同意在边界东段边境地区增设两个边防会晤地点等。³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商定重新开放连接中国西藏和锡金之间的贸易通道,为双边贸易开启了绿灯。在边界问题上,双方除了启动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机制外,还签订一项部分涉及边界问题的《关于扩大边境贸易的备忘录》,即开放乃堆拉山口,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取得某些进展。2004年3月,中国新版地图和2003—2004年版世界年鉴中锡金

1 1998年5月印度的核试验曾导致中印两国通过“边界问题联合工作组”进行的非正式安全对话一度中断。1999年7月,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访华时,中印两国商定将安全对话从“边界问题联合工作组”中分离出来,正式启动安全领域的磋商和对话,并且把安全对话的内容从原则性的战略概念过渡到具体事务。

2 《中国外交概览199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3 《中国外交概览199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都没有出现,而此前中国一直没有承认 1975 年印度对锡金的合并。与此同时,中印双边关系明显改善。2005 年 4 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印,提出两国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将 2006 年确定为“中印友好年”。这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新阶段。

五、结 束 语

中印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印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中外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与多数学者把中印边界问题作为危机管理和外交决策分析的做法不同,本文借用认知理论,探讨了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认知来源以及这种认知所发生的细微变化。根据前面的实证考察可知,从信仰体系的角度说,民族主义、大国情结、不结盟理念和第三世界“领袖意识”使印度不愿改变其心目中的历史边界,甚至不愿就边界问题与中国进行谈判。从环境因素来看,美苏缓和以及关于中印边界的历史文献使印度认为其领土主张具有历史证据和合法性,从而被其视作不在边界问题上进行政策调整的客观条件。从学习过程而言,获得独立后,印度延续了英印政府重视中印边界地区的战略传统,加上对巴基斯坦等国的强硬态度奏效、向北推移边界的行为没有遭遇强硬的反对,印度因此认为只要继续推进边界,造成既成事实,中国就会接受边界现状。

印度对边界认知的上述来源造成了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五点重要认知: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印度边界早已形成;中印协定已经解决了所有未决问题;中国已经默认了“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东段边界;中国不会使用武力回击印度推进边界的行动。在这种认知的驱动下,印度在边界上扩张导致中印边界冲突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边界战争。

战争结束后,虽然印度的认知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战争教训的启示,使印度对边界问题的认知逐渐产生细微的转变。这些转变成为印度认知调整和中印关系改善的观念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印度的认知调整较为明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印关系的改善开启了可能性。不过,这种认知调整过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展开讨论。这无疑需要进一步研究。

作者简介

姜宅九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2003 级博士生(韩国留学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对外政策、东亚安全。

电子信箱:jiangzj03@mails.tsinghua.edu.cn

张清敏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河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美国杨百翰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外交学院法学博士。2004—2005 年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任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代表作有《大棋局:中美日关系风云五十年》(副主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1 年版)等。研究方向为外交政策理论、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

电子信箱:zhangqingmin@cfau.edu.cn

随新民 外交学院副教授。1989 年郑州大学外语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95 年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5 年外交学院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

电子信箱:xmsui@cfau.edu.cn

贾烈英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外交学院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 至 1998 年作为访问学者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进修,2005 至 2006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长滩分校学习。研究兴趣为国际制度理论。

电子信箱:jialieying5159@hotmail.com

盛红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国际刑法与武装冲突专业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武汉大学国际法专业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曾担任联合国驻刚果(金)维持和平特派团专家。代表作有《武力的边界:21 世纪前期武装冲突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3 年版)。

电子信箱:adamsheng@163.com